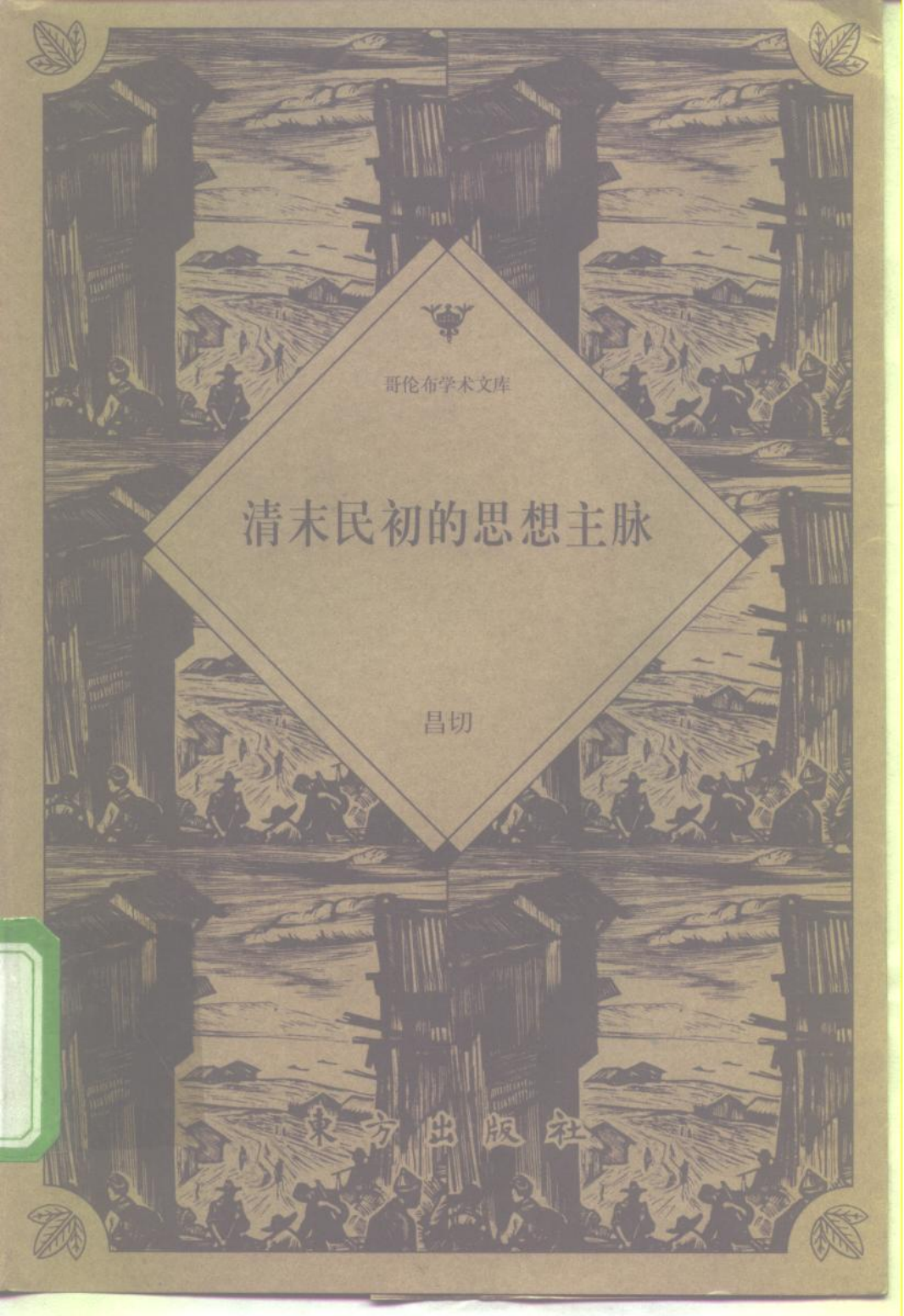




哥伦布学术文库

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

昌切

東方出版社

J102825



哥伦比亚学术文库

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

吕坤



18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装帧设计:刘林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昌切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4(哥伦布学术文库)

ISBN 7-5060-1225-1

I. 清…

II. 昌…

III. 思想史-中国-清后期

IV. B25

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

QINGMO MINCHU DE SIXIANG ZHUMAI

昌 切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1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1225-1/G·230 定价:1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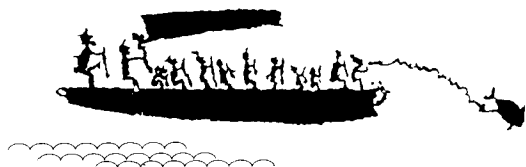


在读了许多种关于哥伦布的传记后，我们就决定以这位15世纪意大利伟大的航海家的名字来命名这样一套学术文库了，同时，我们也选择了10月12日——“哥伦布日”作为这套学术文库的诞辰。

当然。我们是要提倡一种哥伦布式的科学发现和学术探索精神。

哥伦布在《预言书》中曾抄录了古罗马哲人塞尼加的一段文字。为了这套文库，为了我们的作者和读者，我们也要以此刻字为铭：





哥伦布学术文库

策划 方 鸣
F M

主持 刘丽华
L L H

装帧 刘林林
L L L

监制 任宗英
R Z Y

本书得到武汉大学文学院学术研究基金资助

前 言

摆在您面前的《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肯定是一本不轻松的书。我做起来不轻松,您读起来想必也不会轻松吧。

先说做。

五年前起心做王国维哲学(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而到一年后起笔时却鬼使神差地做到清末民初的思想上去,而且这一做就像模像样地、断断续续地做了四年多,才做出这么一部可怜巴巴的小书,可见做起来是多么的艰难。

之所以在反复读过王国维的大部分论著及其相关材料以后另起炉灶,坦率地说,完全是因为感到时贤如佛雏、叶嘉莹等已在王国维研究上下过不小的功夫,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再做已很难翻出大的新花样来,顶多只能在个别的小问题上有所发明,硬着头皮做太难为了自己,搞不好弄巧成拙。事情是这样的:起初只是觉得王国维不好做,担心低水平地重复人家做过的工作,于是就想了解王国维同时代的思想家都说了些什么,以使用作研究的参照,希望做出点新意来;可是这么一来就钻进去了,竟至于越钻越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干脆决定顺水推舟,就做清末民初的思想。

直到做进去才知道,清末民初的思想也不是那么好做的,甚至更难做。按他人设计的路子去做,这倒不太难,可是我不愿意;另辟蹊径,这可太难了,我怕做不下来。那么就只有走中间道路了。因而就从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出发,根据现在的需求,从第一手材料中提炼并进而展开论题。我的具体做法是:借助通行的文化三分

法和梁启超给定的叙述框架,把清末民初的思想断作三代,探讨从物质文化变革到制度文化变革再到思想文化变革的代际递嬗过程,并在探讨这个代际递嬗过程的基础上重审“中体西用说”,重估“五四”以前所谓“低谷期”的思想,重新研究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人政治哲学的性质和体系构成,寻找“五四”核心命题的理论前缘,着眼于三代思想家的思维模式,私设并尝试解释“大循环进化模式”、“中上西下”、“中西对等”和“西上中下”等“无中生有”的概念,追索它们的理论依据,分析“五四”一代分化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根源……做旧题目翻新难,做新题目言之成理难上加难。不过,再难也得耐着性子、挺着身子往下做。

我在四年前本书初稿完成后说过这样的话:选择《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这个论题,本意是想打破学科限制,拓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路子,摸清近代思想的剧变与“五四”思想革命的衔接关系;同时也是想摸清三代思想家、革命家在西学东渐、中国文化合目的的代变过程中如何看待中西文化,如何重构中国文化,如何生成新的思维模式……接续上我先前对“五四”以后文艺思潮的研究,为又一次跨在世纪转折关口的今人制作一点思想“半成品”。找一块硬骨头来啃,个中滋味,不堪言说,至于效果如何,眼下还无法遽下判断。

在四年后本书终于定稿的今天,我仍然坚持上述想法,只是我还想补充强调一点:我所做的一切都与现在息息相关。

再说读。

做离不开读,读也离不开做;做时脑子里总是悬着一个“虚拟读者”(“隐含读者”),读时大概脑子里也总是悬着一个“虚拟作者”,所以,从做说到读,可谓顺理成章。但是,做是我的事,读则是他人的事,我想管也管不了。说了做再来说读,对于我这个做的人来说,是不合适的,还是少说为佳。不过提一下我的愿望也无妨。

我的最大愿望是:希望有人愿意读这本书!愿意与我分享这份艰难!

“前言”就做到这里,请原谅!好在下面有篇“纲要”性的“导论”,就请读一读,觉得不合口味,就抛开了事,觉得还有那么点意思,就接着读好了。

目 录

前 言	DG/2/29 (1)
导 论	(1)
一、释名	(1)
二、断代	(3)
三、历史逻辑序列	(6)
四、三种思维结构	(9)
五、三个概念	(11)
六、三个层次	(13)
七、文化转换的理路	(15)
八、难点或要点	(17)
第一章 守本开新的中体西用说	(19)
第一节 中体西用	(20)
第二节 两种理论预设的冲突	(26)
一、违背古训	(26)
二、两种相悖的理论	(29)
第三节 变政改制的微弱呼唤	(32)
第二章 重构政治哲学	(36)
第一节 颠倒道器和重释体用	(38)
一、颠倒道器	(38)
二、重释体用	(41)
第二节 托古改制和托古革命	(45)

一、今主古奴的托古	(45)
二、融通中西的政制模型	(47)
第三节 创格的政治哲学：本体范畴与终极理想	(51)
一、元—仁与大同之域	(53)
二、心与五无境界	(62)
三、生元—心与极乐之天堂	(67)
第四节 创格的政治哲学：大循环进化模式	(73)
一、首功当记在康有为名下	(73)
二、大循环进化模式	(75)
三、章太炎并未抛弃进化思想	(84)
第五节 政治哲学的限度	(91)
第三章 思想革命的活水源头	(98)
第一节 走向思想革命时代	(98)
第二节 来自历史深处的“五四”核心命题	(106)
一、两代的精神联系	(106)
二、非孔反儒——破	(112)
三、个性解放——立	(126)
第四章 西上中下	(148)
第一节 从中上西下到西上中下	(149)
一、中上西下	(150)
二、中西对等	(153)
第二节 西上中下	(157)
一、西上中下文本结构	(158)
二、“五四”前的西上中下文本结构	(160)
三、“五四”时期的西上中下文本结构	(167)
第三节 社会进化观与有机整体观	(177)
一、社会进化观	(177)

二、有机整体观	(184)
三、疑点	(189)
第四节 “五四”一代的分化	(192)
一、历史渊源	(193)
二、思想根源	(198)
第五章 再审西上中下	(207)
第一节 相适与不适	(209)
一、新理	(209)
二、相适	(212)
三、不适	(219)
第二节 应不应该西化	(227)
一、正常与反常	(227)
二、应不应该西化	(230)
结语：代际递嬗	(239)
一、两度代际递嬗	(239)
二、青春化趋势	(240)
三、文化差异	(241)
四、文化范式的重铸	(247)
主要资料来源	(249)
主要参考书目	(252)
附录一：关于新保守主义	(256)
附录二：文化重构的基点应当建在哪里	(262)
后 记	(277)

导 论

起手作一导论,清理一下思路,解释一下题意,交待一下研究对象、取材范围和主要观点,提示一下理论背景、处理方法和基本构架,大概不算多此一举吧。

一、释 名

清末民初,在本书中特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到“五四”时期结束(1927年)这么一个历史时段。这是一个两个世纪交接、两种社会制度交替的千载难逢的特殊历史时段,是古老的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痛历“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王韬语),中国社会在西方诸列强轮番侵略、劫掠和压迫下从古代向现代转型,中国文化在西方近代以来文化有形无形的撞击、重压和催逼下逐步从中心退向边缘而力图“东山再起”、重塑新形象,中国的有识之士将民族国家“创巨痛深”的历史记忆刻勒进脑壁而急欲励精图治、富国强民并重振雄威的“过渡时代”(梁启超、杨度语)。

处此“过渡时代”,渊源深厚的中国文化终于在古今中外文化相激相荡的剧烈冲突中解体与重构。中国文化的解体与重构,似乎依循着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是“三代”文化在中国社会现实需求的策动下逐代递嬗的过程。由物质文化而制度文化而思想文化,由表层而深层,由部分而整体,由守本开新而本末俱变而思想

革命(整体变革),融中西,洽古今,续中见反,逐代递嬗,从而在中国文化形象的重塑历程中凸显出一条清晰的思想主脉。

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从这条文化代际递嬗的线索中把握这一思想主脉。我将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三代思想的内容实质、肌理脉络、理论依据和文化转换序列和代际递嬗方式之上。在此基础上,我还将透过纷繁复杂的种种表象,深入底里,抽象出三代重要的思想家不同的思维模式,分析“中上西下”、“中西对等”和“西上中下”这三种制约三代思想家运思的主导性思维模式的区别与联系,并着重探讨在第二、三两代思想家手里生成定型、日后广为流行、至今仍然顽强地存留在许多人头脑中的“西上中下”思维模式,以及第二代思想家融通中西的政制模型和“大循环进化模式”等等,讨论其外缘内蕴、理论基础、基本特点和价值意义,并试着给出我的初步评价。

由此可见,本书的基本做法不是清仓查库,不是在清仓查库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地罗列一大堆思想史材料,不是在罗列一大堆思想史材料以后面面俱到地做出四平八稳、貌似公允的评述。我原本就没有考虑过要把这本书做成介绍清末民初思想文化的高头讲章,甚至也没有打算为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作一通论或述评。不是不想作一通论或述评,而是感到时间太紧,要处理的材料太多,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惟恐一旦真的动起手来收不住,把好不容易选定的这个题目给弄砸了,于是便退而求其次,暂且沿着清末民初文化代际递嬗的线索,就着此一“长时段”思想文化的主脉,做做我喜欢做也做得来的工作。

要想在清末民初文化代际递嬗的线索中把握其思想主脉,首先就必须给文化一个说法。文化可是时下思想文化界的一个大热门,说的人多,说法多,误解歧义也多,暧昧得很,清理起来相当困难。不说别的,据说光是文化的定义,在国外就有数十上百种之

多。我知道,在文化这个概念上来来回回地兜圈子,是兜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干这种事非我所能也非我所愿。不过,我也知道,倘若要使全书顺利地展开,又不能不预先设定一个可靠的论述起点,也就是说,给出我对于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我的界定非常简单,那就是:文化是人的表意方式(或行为)及其结果。按我的理解,人的思、言、行是文化;人的所思、所言、所行也是文化。人的思、言、行的结果是什么?是人的生命的外化(物化)形态,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化的自然。这种人化的自然凝聚着人类特有的品性,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不是其他物种所能复制的。人类文化之所以有东西、雅俗、古代现代、都市乡村、精英民间、贵族平民之类的划分,就是因为生活在不同时域、地域的不同人种,以及生活在同一时域、地域的不同人群,在表意行为及其结果上存在差异。

二、断 代

按照以上对文化所作的语义界定,笔者采用了一种目前在学术界比较通行的文化三分法,即把文化分解成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三个层次,然后再依据内容和性质的差异,把清末民初这近 90 年间的文化依次断为三代。显而易见,这里的“代”不是一个日常生活中通用的纯粹和精确的时间概念。它既不是改朝换代的“代”,也不是 10 年或 20 年一代的“代”,而是内含文化特质的“代”,举其相当者,或可以梁启超所说的“期”应之。梁启超在其著名的史论文章《五十年中国进化论》中,把从 19 世纪中叶到他这篇名文问世时大约七八十年间的历史裁为三期。梁在该文中说: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

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中日甲午战争——引者)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了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本书的断代与梁启超的分期大致相当。

“兴废系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中国文化在清末民初的代际递嬗,正是随缘附势、因时应世而变的适例。三代文化变革起初侧重物质,接着偏重制度,最后注重思想,谋求整体的变革,这是由表及里的逐层深入。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一代有一代突出的重点,分期或作代际划分,毫无疑问,是说得过去的。只是笔者隐隐约约有这么一种感觉:梁启超对三期文化变革内容的辨识似乎有些绝对化了,至少忽视了代际文化交叉和互渗的复杂性。三代文化错综

交织,相续相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常出现你闯到我府上来,我进到你府上去的情况,并非像梁启超在纸面上所显示的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比如说吧,张之洞是“中体西用说”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最佳的阐释者,这当然不成问题,问题是他那篇因得到清王室奖慰、劝勉而风行海内外、耸动朝野上下、集中体现“中体西用说”基本意旨的《劝学篇》,却是在戊戌年间变政改制最为关键和危急的时刻有感而发而刊布于世的。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在甲午战争以前已经基本成型,而他最负盛名的《大同书》却迟至 20 世纪初才在他流亡日本期间正式成书印行。孙中山于 1894 年弃医从政,致力于变政改制的大业,并不比康有为和梁启超晚多少,只不过彼时非其时也,其声微弱,其名不彰,且常如“丧家之犬”东躲西藏。几年之后,康、梁败走他国,孙中山和章太炎时来运转,声望日隆,兴义师直捣龙廷,完成了彪炳千秋的辛亥革命,然而在此期间,他的政治哲学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待它真正的体系化则已到了建国时期。另外还有章太炎、严复以及王国维、鲁迅等人,他们早在“五四”以前就超前性地把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解放”的思想启蒙当成中国社会变革的头等大事来做。善变的梁启超失意后流亡日本,也摇身一变,紧步严复的后尘,宣扬启蒙性质的“新民说”。谭嗣同的思想最显激进,逮住什么他都敢骂它个狗血淋头,他的启蒙思想亦可视为“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五四”一代的中西文化观续自严复和王国维等人,“五四”的核心命题几乎全有理论上的前缘……

事实证明,各代思想彼此呼应、相互交迭,每代文化的变革都不是那么简单划一,分界远不如梁启超所想象的那样分明。在物质文化变革的同时,制度文化的变革就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制度文化变革的同时,思想文化的变革就已经如影随形,顺势展开。

从大量的史料来看,各代文化的变革不仅不简单划一,而且还从未出现过单兵突进、单线延伸的情况。第一代文化变革侧重物质却并未尽弃制度以至思想;第二代文化变革偏重制度却并未无视物质、尽绝思想,反而异乎寻常地重视物质文化的变革和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解放”的思想启蒙;第三代文化变革注重思想却并未稍曾遗忘和怠慢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变革。

三、历史逻辑序列

从理论上讲,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单从这个整体上切下一块,单就这切下的一块做文章,是不大容易做成功的。单方面的变革无异于把头塞进现代社会的门坎,身子还被卡在现代社会的大门之外。物质文化的变革必然要求辅之以制度文化以至思想文化的变革,制度文化的变革必然要求伴之以思想文化的变革,而思想文化的变革也必须以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变革为前提。纯而又纯的物质文化变革,就像纯而又纯的制度文化变革或思想文化变革一样不可理喻,既有悖于史实也违背了文化转换的一般规律。

然而,就具体的史实而言,又不能断然否认各代各有自己的侧重点。由对西学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由对中学的缺陷体认不深到体认至深,这是认识由封闭到开放的逐步深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逻辑过程,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或者干脆说是一个历史逻辑过程。逻辑离不开历史,逻辑是历史的逻辑;理论离不开史实,理论是史实的理论。因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清末民初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会出现这么一个起初侧重物质文化变革、接着侧重制度文化变革、最后侧重思想文化变革的文化代际递嬗的历史逻辑序列。